

員優良的生產組



著赫基才奇印 · △  
言華金  
行印社版出人工

# 良復所質印 組產生的

398(2)  
7724



著 赫基特邱 . A

譯 途 莊

優質品的更產生組

作譯者 A·邱特基赫  
出版者莊達

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三

印 刷 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 裝 許 不

[ 125 ] 1—10000

# 組產生的良優質品

譚添基著

## 目 錄

給讀者的話	一
「依然哨子」過的生活	一
副工長	一
聯合殿中最優秀的女工	一
「我們是莫斯科人！」	一
尼洛夫追過了我們	一
正當的非難	一
我的建議被接受	一
一大運動的各種根源	一
顯著的變革	一
這樣得到了成功	一
走到了界限！	一

奧伊凡·沙茨基的會晤

全民運動

閱讀信件

## 給讀者的話

每天郵差都有信帶給我。信封上蓋着許多都市的郵戳。人們從列寧格勒、基輔、  
弗比利斯、巴庫、塔什干、伊凡諾夫、明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從許多其他的地  
方寫信給我。寫信給我的有我同行的紡織工人，有冶金工人，有採礦工人，有鐵路工  
人，有機器製造工人，有農業工作者和蘇聯的軍人。那些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們，以  
前不相識的人們，都寫信給我。讀到他們那些友愛的、充滿了衷心溫暖的言語，你就  
會想：『這都是你的老朋友啊。』

不管這些信是從誰那裏寄來的——工人或是工程師、拖拉機手或是職員——裏面  
都有許多相同的東西。而這相同的東西就是對於完成國家計劃、對於提前完成斯大林

五年計劃的關心。對於熱愛自己祖國的蘇維埃人民來說，沒有再比國家的利益更高貴的東西了。我們知道我們個人的幸福是有賴於整個國家的繁榮。因之我們的每一個人都不拘他是在什麼崗位上，都是這樣精神鼓舞地勞動着，而把所有自己的知識、能力與經驗貢獻到所委託給自己的事業上去。

我會不止一次地觀察到，蘇聯的人民是多麼歡喜地讀着蘇聯部長會議所屬中央統計管理局關於完成各季或是全年的計劃的報導。讀到關於工業與農業所有部門的急遽的高漲的報告時，同志們便會更清晰地想像到，他們獻身的勞動是獲得了何等卓越的成果。他們的思想與感情是可以用馬雅柯夫斯基的話來表達出來的：

我感到高興——

因為我的勞動

溶合在

我的共和國的勞動裏面。

從莫洛托夫州西瓦村的一個與我不相識的人那裏，我接到了一封信。牛油與乾酪

製造工廠的工長沙那切夫同志說：

『當我們在工廠裏知道了你那開始爲獲得優良品質生產組的稱號而競賽的提議時，十四個生產組立刻便決定了參加這一競賽。我的生產組走在最前面。它只生產最高級種類的產品，並且不打算把第一位讓給別人，雖然其他的那些生產組已經正在趕上我們。我的生產組全體同志委託我告訴你，我們是不把第一位讓給別人的。祝你健康並希望你在工作中獲得新的成功！』

我從國內各處接到成百封這種贊同我們的動議的信件。他們每一個人都送來了許多令人歡喜的消息。見到你自己和你的同志們做了有利於公共事業的事情，見到你的計劃在人民中間獲得了熱烈的支持，那是可以欣慰的事情。

在那些信件中間也有不少這樣的信，在這些信件裏，同志們提出意見：請求告訴他們怎樣把爲了出產優良品質的產品的競賽更好地組織起來。公路建造者蘇拉哥同志寫着：『可敬的亞力山大·斯鐵潘諾維奇！我的夥伴們要向您請教，怎樣把您的建議應用到自己身上來。』葉列萬斯基工廠的一羣年輕工人寫信來請求說：『請您告訴我

們您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您怎樣能够只製造第一流質量的產品，怎樣領導全組的人員。」

我自己和每一個蘇維埃人一樣，並沒有什麼秘密的生產經驗。如果把我在自己常年的工作中所訓練出來的所有那些織布工人和副工長們集合在一起，那麼就會可以把他們當做好幾組的紡織工人來用。這種事當然並不少見，但是也不多。我聽說莫斯科的磚瓦工人伊凡·希爾科夫在十五年中間曾教出了大約有兩千人。這是值得驕傲的呀！

在我的生產組已能製造出只有第一流的紡織品之後，我就把自己的經驗告訴給列寧格勒的那些紡織工人，在莫斯科的勞動報舉辦的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星期二座談會』上發表演說，並且把自己的各種工作方法告訴給那些成百的從別的城市來、而曾到過我們的聯合工廠的同志們。

但是，顯然地，這還不够。帶有各種問題的信繼續地寄來。這使我想到要寫一冊關於自己的生活、關於工作和自己所領導的全體人員的事情的書。如果我們這微末不

足道的經驗在爲爭取高等質量的產品而進行共同鬥爭中有一些用處的話，那麼我就會非常歡喜了。

### 『依照哨子』過的生活

不久以前，我曾出席了莫斯科各企業青年工人的集會。在一間大廈裏出席了各汽車工廠、機器製造工廠、電機工廠、鐵路上廠、紡織工廠、製鞋工廠和針織毛工廠而來的青年男女。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沒有超過十八歲到二十歲的。他們只今然是在不久之前——一年半或兩年前——才開始踏上了勞動的道路。他們從工藝學校畢業之後，是首次到車床邊工作。

如果對我們蘇維埃人的技藝加以判斷的話，是決不能以年齡爲標準的。所有在那天晚上登上講壇的人們，都是這樣精熟地談論着那些最複雜的生產問題，就和平常那些熟練的幹部工人所說的一樣。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鑄造車間青年生產組組長、青

年團員穆赫律尼娜，談到她的那一個集團如何只生產優良的產品時，興奮地而又帶着青年人的朝氣地指出：現在存在着的各種廢品的限度是可以而且也是必需要顯著地被改變的。

對那些坐在大廈裏的人們，她問道：『你們知道這些限度是什麼時候規定出來的嗎？還是在偉大衛國戰爭以前。而在最近這幾年裏，又有多少新的事物發生出來喲！各工廠獲得了新的第一流的設備。工人的技藝提高了。現在在我們的車間裏所出產的鑄造品差不多有百分之百是能用的，而十年前却不會到過百分之八十。請想一想，能够用以前的限度來比麼？那些舊的限度並不是向前推進的。它們只是對於那些忽略自己職責的人們覺得方便而已。』

隨後，登上講壇上的是『加利伯』（口徑）工廠青年生產組組長旋盤工符拉基米爾·烏特金。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筆記本來，就開始讀着數字。這些數字——集體工作指數——是最鮮明的句子說來更能使人信服的。在幾個月的時間裏，符拉基米爾·烏特金和他的同志們，由於減低了廢品的數量，由於節省材料與工具，而為國家

節省了一萬多盧布。

我興趣盎然地聽着我那些青年朋友們的講話。講話的人很多。但是每一個人，雖然在本質上都在說着同一件事情，而其內容却是各各不同的。同志們交流經驗，敘說自己合理化的建議，談到和工長與技術家們共同和睦的工作，談到未來的各項計劃。而我見到坐在大廈裏的那些車間主任、工廠廠長、和政府副部長們如何地在自己的本子裏記着：許多是那些青年工人所談到而值得普遍傳播並且應用到一切企業上去的。所以我們的青年人是勤勞多能而頭腦清醒的！看他們的工作看他們對待勞動的態度，怎樣努力於獲得學問、知識，你就會感到甚大的滿足的。

聽了那些講演者，我就想起了過去的事。而過去我是個青年工人。但是在蘇維埃政權之前的那個時候，我能够站到講壇上來敘說着類似的事情麼？不能的。我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學識，而和所有我的那些同輩人一樣，只是時作時輒地讀些書——在那個時候工人是並不需要識字的。所以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講壇。在當時人們是把自己的技藝的秘密隱蔽起來的。

我的勞動生活，比起青年的蘇維埃工人來，全然是以另一種方式而形成的。我的勞動的道路比起任何一個老的幹部工人的勞動道路來，也很少有什麼區別的地方。而在資本主義的企業裏，在勞動者完全沒有權利的諸條件下，我是體驗到了工作上所有的那些『好處』的。

當我滿了十三歲的時候，母親便給我穿上了件新的印花布的襯衫還有一頂小帽子，這襯衫和帽子是我只在過節日的時候才穿的；母親說：

『兒呀，準備走吧！』

她自己眼裏已經含着淚。那時她已比別人更好地知道什麼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了！

母親在尼古里工廠當織布工人，她看到那些和我一樣的小夥子，是如何疲憊不堪地搬運着裝有紗線的箱子，是如何把笨重的大木塊運到火爐房裏去，並且從清晨到夜晚地搬運着機器。

在我們家裏，除去了我以外，還有四個孩子。做園丁的父親和做織布工人的母親無法養活我們。顯然地，家裏面誰也不能指望我的工資。父親說：『只要是自己先能

弄飽了肚子，也就會好一些了。」

我很久很久也不能忘記和我的家裏人分別時的情景。大家都把我圍了起來。只是在昨天我還和小弟弟們在院子裏跑，打棒子球，玩『小木棍兒』的遊戲，而現在一切孩子的遊戲却均告終結了。父親把手放在我的肩頭上說：

『沙沙！看吧！現在他們可就都盼着你哩。』

說着就用手指着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

我和母親一同到傑道夫紡織工廠去。這工廠離開我的家有十二公里。但是看當時的情形，母親似乎是已經到那裏去過好幾次而好不容易才能請求他們允許我到那裏去工作。在那個時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們在每輛電車裏，在每條街道上，你都可以讀到在什麼什麼工廠、什麼什麼建設上招收各種專門技術的和普通的工人的告示。而從前的人們却是成月地在尋找工作而找不到它。

我被分配到紡織車間去，我的工作是搬運紗線。我已經說過這種工作是會如何地折磨着未成年的孩子們。不久之前，我讀到一層關於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的書。在這冊書裏面，曾從這位作家的日記中，引用了以下的這些話：

『三月三十日，到織襪工廠去。哨子的聲音是表示說：五點鐘孩子走上車床一直站到八點。八點吃早茶而又工作到十二點，下午是從一點到四點。四點半又到八點。每天都是如此。我們每天在床上聽到的哨子的聲音就是表示這些事情的……』

我要過的生活就正是這樣的生活——『依照哨子』的生活。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沒有別的出路，母親就只能把我留在工廠裏面了。

因之在我自己生涯的第十四個年頭的時候，我就成了一個工人。清晨很早的時候聽了笛聲便到工廠去，只有在很晚很晚的時候才回到工人營房裏來。當時我們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時，與成年的紡織工人一樣，但是所得的工資却比他們少一半。

工頭喊着說：『喂，小夥子，快些轉呀！幹活兒幹膩了麼？當心我要把你趕出去呀！』

對於我們男孩子，工頭是個最兇惡而可怕的人。他是忠實於廠主的管家，他一分鐘也不叫我們休息，並且把連成年人也不是永遠能擔當得起來的工作交給我們來做。

什麼都允許他幹：打後腦勺兒、咒罵、罰錢，趕出工廠。這後者是大家特別害怕的。工頭說是要『趕出去』的這一威嚇，時時刻刻都在威逼着我們。

他們給我一個小本子。它的用處我到十天之後才知道。正當我從樓梯向下搬箱子的時候，我失腳了，有一部分紗線散落了出來。工頭看到這個，就走到我面前對我說：

『把自己那小本子拿出來。』

拿起鉛筆來他就寫上：『做事疏忽，扣盧布一個。』這就是罰款。當然，工頭知道箱子可能會壓了我的，但是他却漠不關心。我如果殘廢了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和我一樣的人走來代替我。還有不少未成年的人們向工廠的大門裏面擠咧。

不拘是年輕的還是上了年紀的，當時隨時都有被處以罰金的危險而毫無什麼理由。人們到辦公室去領工資的時候就要他把罰金簿交出來。一看，則他的工資中就會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五留在辦公室裏面了。

當時我們住在帶着吊板床的、昏暗而龌龊的工人營房裏。每張吊板床上睡四個